

改革開放以來 香港客籍社團「再華化」研究

• 莊玉惜、梁元生、鄭宏泰

摘要：近年中國境外華人社團數量迅速增長且與中國大陸交往頻繁，學界多歸因為改革開放、中國崛起後「再華化」的有機發展，卻鮮有留意中國政府扮演了推手角色。過去四十年，尤其香港回歸後中國政府大力推動成立華人社團，其中以同鄉會為最，數量倍增至今約八百個——由愛鄉推及愛港並昇華至愛國，負起政治功能，支持特區政府施政和愛國愛港陣營參選，晉身為中港政府的管治夥伴。然而由上而下的「再華化」模式，收窄了社團的政治光譜，有礙它們作為政府和民間社會溝通的橋樑。本文透過敘述近年中國政府積極介入香港客籍社團事務，檢視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和社團締結關係的模式。

關鍵詞：同鄉會 客籍社團 香港管治 華人網絡 「再華化」

一 中國崛起與「再華化」論述

華人社團、華文學校和華文報章被視為中國境外華人社會形成的三大支柱，其中社團在凝聚散居各地華人方面無疑起着重要作用^①。近年隨着中國崛起，有關境外華人及社團「再華化」的討論十分熾熱，成為了解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政府重構境外華人網絡的最佳切入點。「再華化」蘊含兩個概念：「再」與「華」。「再」體現在時間上，隨着時間推移由關係疏離發展至接觸頻繁；其一為量化，社團數量及參與人數倍增，與中國大陸交往廣泛，由文化交流以至政治經濟活動；其二為質化，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1949年成立至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境外社團與中國大陸的交往幾乎陷於停頓，專注服務所在地鄉親，經過四十載漸行漸近，中國政府再度凝聚境外華人放眼中國，重拾遊子「身在境外、心繫祖國」的情懷。這裏帶出了第二個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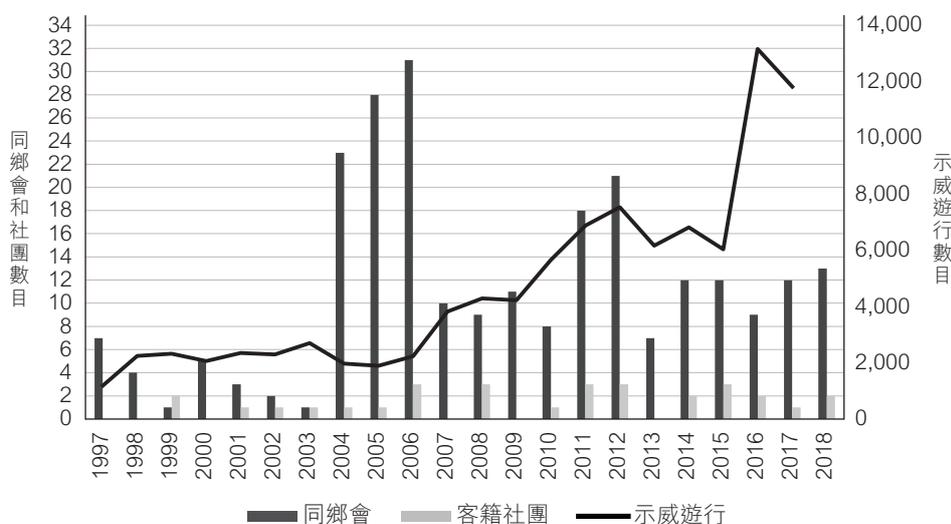
「華」，顯然意指中國大陸；政權易幟，故鄉依然，當中國盛世再現，華人身份認同感提升，順理成章由愛鄉推及至愛中華大地故土。

「再華化」論述大致有下列三個方向：第一，開拓市場。由中國實行改革開放衍生的經濟利益帶動，中國市場開放引起國際社會關注，海外各國意識到當地華人網絡對拓展中國市場的重要性，鼓勵華人成立社團，加強和中國聯繫。另一方面，開放政策的深化對境外華人同樣具吸引力，他們積極設立社團作為交流聯繫的平台，透過凝聚鄉情擴大華人間的商業網絡，進行經濟合作，面向龐大的中國市場^②。第二，鞏固社團網絡。各國在實施新經濟發展策略的同時，也進一步放寬對當地華人的管制，華人藉此對社團進行重新整合，不獨在數量上迅速增長，且加強社團間的團結和合作，壯大華人社會，亦推動了社團的發展^③。第三，凝聚民族情懷。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門敞開，同根同源的華人與祖國之間割不斷的紐帶自然再次接合。而隨着中國在政治及經濟發展上漸趨強大，華人的向心力益增，進一步推動社團組建^④。

顯然，不少研究認為社團「再華化」乃改革開放、中國崛起後理所當然的結果，鮮有注意政府扮演的推手角色。其實，無論是清廷、民國政府，還是當今中國政府，均積極推動成立境外華人社團，以僑引資，提升民族認同，形成國際輿論以聲援國家政策^⑤。早於1978年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宣布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前，中國政府已意識到境外華人龐大的資本網絡將起着重要作用，該年年初重新設置文化大革命中停止運作的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管僑務工作，動員境外華人回鄉投資建設^⑥。翌年，國家領導人鄧小平一錘定音：「我們現在搞建設，門路要多一點，可以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華僑、華裔也可回來辦工廠」，奠定以抓緊境外華人網絡為往後推動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⑦。其中位處中西樞紐的香港順理成章成為重新締結相關網絡的首站，隨着四個經濟特區在毗連的深圳、珠海、汕頭、廈門拔地而起，各省市官員紛紛派員參與香港華人社團尤其是同鄉會活動，藉此平台鼓勵鄉親回國投資建設。

隨着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同鄉會的角色亦有所轉變，負起政治功能。特區政府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無疑擴大人們對參與特區管治的期望，這難免與百多年來殖民政制所主張的「去政治」管治邏輯不符；體制的不協調，無法疏導人們的政治期望，特區政府和社會的衝突由之而起^⑧。加上九七回歸後亞洲金融風暴爆發，政府未能適時解困，觸發2003年7月1日大遊行（下稱「七一遊行」），主辦單位聲稱有五十萬人上街，縱然建制派對數字有異議，但無可否認的是此次遊行壯大了公民社會力量，自此社會運動頻生，重控政府管治能力^⑨。雖然現有研究提出「七一遊行」為香港政治生態的轉捩點，促使中國政府加強對香港政治的介入，作為特區政府的強大後盾；可是它們並沒有注意到建基於同鄉會等親建制社會力量的新管治模式在「七一遊行」後悄然而生，有別於中港政府與親建制商界和政黨原有的精英管治聯盟，這種新模式更重視社會基礎及公眾輿論的構建，成為與公民社會對壘的親建制社會力量。截至2018年11月28日，本年新成立的同鄉會共十三個，

圖 1 香港新增同鄉會和客籍社團與示威遊行的數目 (1997-2018)



資料來源：示威數字(公眾集會及遊行)來自香港警務處，參見 www.police.gov.hk/ppp_en/09_statistics/poes.html；同鄉會數字，參見註⑩提供的網站；客籍社團數字來自報章、社團刊物及社團網站。

說明：所有數字截至2018年11月28日。

已超逾去年全年總數(圖1)。究竟中國政府為何積極籌建同鄉會？而同鄉會是如何由以僑引資的平台轉化為中港政府的管治夥伴？

二 中國政府的推手角色

對中國政府而言，社會運動要求加快民主步伐，屬於激進的政治訴求，會影響社會穩定，危及特區管治，因此有必要建立親建制的社會力量以資抗衡；加強對華人社團事務的介入是為一途，而將同鄉會打造為管治夥伴最引人注目。之所以以同鄉會為對象，除了因為政府與社團的關係在歷史上由來已久，更重要的是社團具備社會基礎，這是親建制商界及政黨等管治夥伴所欠缺的^⑩。同鄉會的社會基礎體現在三方面：第一，作為以傳統地緣紐帶結合而成的自願組織，同質性較強，對會員的社會動員效能亦相對較高，有助推動支持特區政府管治的集體活動；第二，擁有龐大社會網絡，如客籍社團會員人數由100至3,000不等^⑪，累計十數萬人，縱然是香港規模最大的親建制政黨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民建聯)，截至2018年10月也僅得38,000名會員而已^⑫；第三，部分同鄉會設有地區辦事處，網羅隱沒各處的鄉里，成為選舉時親建制候選人的堅實地區支柱。

別於昔時，回歸以來中國政府對華人社團事務的介入，不再停留在以僑引資等經濟層面，因應社會運動頻生下的新政治格局，政府開始將社團囊括為管治夥伴，兩者關係有所改變。首先，在政府推動下，單以同鄉會為例，自1997年至今數目翻了幾番，增至大約八百個^⑬。其增幅軌迹與社會運動增

幅吻合，正好顯示中國政府在「再華化」背後發功，以親建制社會力量抗衡反對派的社會力量（圖1）。其次，政府重整社團的政治定位，將之轉化為愛國愛港社團。透過由社團主辦的遊行及簽名運動等集體活動，凝聚親建制的社會力量，形成支持特區政府政策的公眾輿論。自此，同鄉會等社團不再純粹以聯誼鄉情、建設家鄉為目的，而兼負凝聚鄉親支持特區政府施政和愛國愛港陣營參與選舉的使命。從微觀角度而言，政府對社團事務的參與力度緊扣當地政治發展；而從宏觀角度觀之，中港連為一體，香港是中國大陸最堅實的地緣依託，其繁榮穩定有助實現改革開放後的中華民族復興，箇中關鍵是抓緊社團——尤其是凝聚鄉情能力較強者，將其培植為愛國愛港力量。將社團由以僑引資的經濟平台轉化為管治夥伴，盡顯中國政府在社團「再華化」背後深含更大意涵，為改革開放、中國崛起發揮政治功能。

綜觀而言，「再華化」有機發展的分析顯然過於簡單，想當然地認為改革開放、國家經濟強盛自會產生連串「再華化」效應。新時空下的「再華化」，並非純粹循環往復，改革開放創造復興條件後的有機發展。大國框架內衍生出來的社團政治，重整了政府和社團的關係：社團民間形象被淡化，轉化為一股代表中國政府的政治力量，這從近年同鄉會的運作可見一斑。由上而下、具濃烈政府色彩的「再華化」模式，將社團納入大國體系內，影響其作為中國政府和香港民間社會的溝通橋樑，令社團凝聚社會的作用大打折扣^⑭。

本文集中討論香港客籍社團蓬勃發展與中國政府推動的關係，探討改革開放後政府在「再華化」方面的推手角色，如何驅動同鄉會等聯繫鄉誼的民間團體，轉化為愛國愛港的社團，負起支持中港政府的政治功能，並闡述建基於親建制社會基礎的新管治模式。由此總結四十載以來中國政府進行的境外華人網絡構建，重新思考政府應如何調整與社團的關係。以香港客籍社團為研究個案的原因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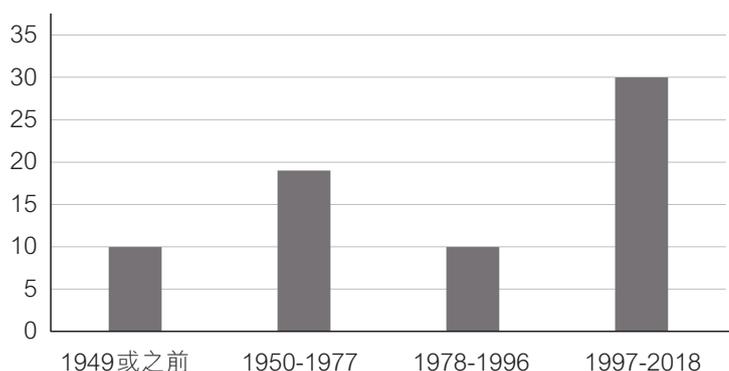
一是地緣親近性，香港為改革開放後中國最易於接觸的境外華人社會，加上其外向的屬性，頗具打通各地區華人網絡的戰略性意義，不僅成為中國聯繫境外華人的「超級聯繫人」，還充當引進華人資金和技術的重要渠道，對中國企業走出去和邁向國際化發揮獨特作用^⑮。隨着回歸後政治環境的重大變化，中國政府對社團事務的參與程度益增，這對社團政治帶來甚麼轉變值得探究。二是傳統華人社團為中國和境外華人聯繫的主要紐帶，其組織性有助中國政府有效統合華人，故此要了解政府在華人網絡構建上的角色及部署，一定要從社團入手^⑯。三是客籍社群具發達的國際網絡，單是香港便逾百萬人，為世界上其中一個客家人集中居住的地區^⑰。現時香港共有七十二個客籍社團（詳見附錄），以同鄉會為主要組合形態^⑱。加上客家文化以語緣為紐帶，在地緣基礎上進一步強調語緣紐帶，內部凝聚力更強，能在政治上聚合支持力量，在經濟上達到引資目的，透過客籍社團可了解凝聚力強的社團的華人網絡構建^⑲。

本文所使用的資料主要來自香港報章、客籍社團刊物及網站、現任社團領導人的深度訪談。以下將論述客籍社團在創辦時間、組合形態、政治光譜方面呈現的「再華化」特徵，接着檢視改革開放後至回歸前以及回歸迄今兩個時期，剖析中國政府推動社團籌建與政治經濟變遷的關係和影響。

三 客籍社團的「再華化」特徵

境外華人社團除了因應十九世紀大批華人飄洋過海謀生，負有凝聚和服務境外鄉里的重任外，一直以來熱心祖國發展，如晚清和民國年間號召華人捐獻支持辛亥革命及抗日活動^②。其後由於1949年中國大陸政權易手，加上後來發生文化大革命，境外社團和中國之間交往中止，轉而聚焦服務所在地鄉親，更有不少結束會務^③。隨着1978年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境外社團如雨後春筍般成立，致力籌建家鄉建設及工業投資，造福桑梓，成為以僑引資的平台^④。香港回歸後，社團數量出現戲劇性急增，與政治生態變化息息相關，呈現出社團「再華化」新形態的政治面貌。由於社團興衰及運作繫於中港政治及經濟發展，按此論其成立時間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1) 1949年政權易手前；(2) 1950至197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至改革開放前；(3) 1978至1996年，改革開放後至香港回歸前；(4) 1997年回歸迄今(圖2)。

圖2 香港現存客籍社團成立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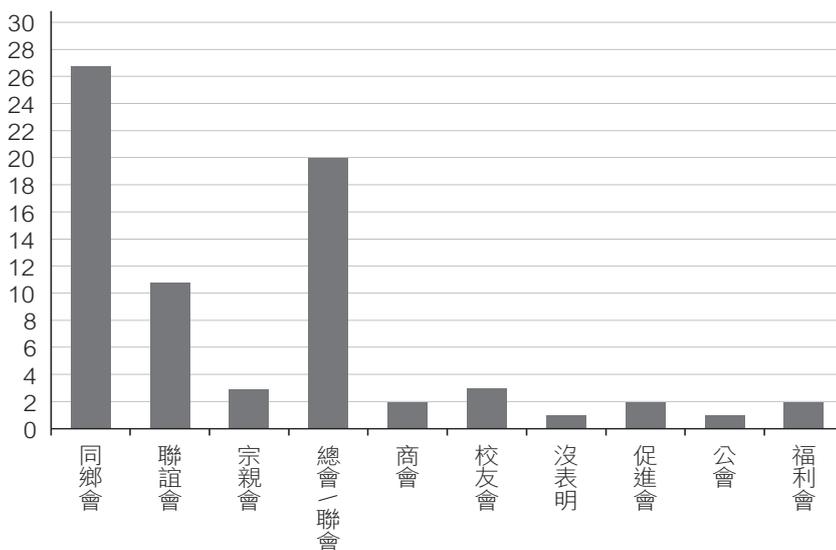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報章、客籍社團刊物及網站。

說明：由於成立時間不詳，其中三個社團(參見附錄)並未包括在內；社團數字截至2018年11月28日。

儘管海內外頗多研究將境外華人社團數目大增歸因於改革開放後「再華化」的有機發展，惟現時活躍於香港的七十二個客籍社團中，約四成(三十個)創立於回歸後(圖1、2)。若以數字論「再華化」，社團湧現潮集中在近二十年，我們應該怎樣理解這個時間段的背後含意呢？1997年回歸初期至2003年的「七一遊行」前，客籍社團增長未見明顯，僅增加五個而已；不過，歷經是次大規模遊行後，2004至2018年間社團一下子激增了二十五個(圖1)，且大多以同鄉會名義組合，與整體同鄉會數量的快速增長相呼應。除了同鄉會外，還有以聯誼會或福利會等名義組合而成的客籍社團(圖3)，其組合原則與同鄉會無異，同樣以傳統地緣紐帶為主。而更重要的是，這些社團的成立乃因應社會運動爆發及特區政府的管治需要(下詳)。

隨着香港回歸，加上中國綜合國力日益強盛，在大勢所趨下社團的政治光譜也呈現「西瓜靠大邊」的現象。事實上，現時同鄉會等社團的政治光譜只有親中及不反中之分，親大陸與親台灣(或親共產黨與親國民黨)社團的對壘

圖3 香港客籍社團分類



資料來源：報章、客籍社團刊物及網站。

說明：社團數字截至2018年11月28日。

早已消聲匿迹。追源溯始，十九個創辦於1950至1977年的客籍社團，絕大部分在初創時持親台立場。1949年政權改弦易轍，大批難民逃難至香港，易於形成難民心態，既對共產政權抱有懷疑，又緬懷敗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親台社團便成為凝聚同鄉的平台。

回歸前(1950至1990年代初)，親台社團經常高姿態支援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例如1954年《工商日報》的一篇報導稱：「旅港興寧同鄉會為響應台北華僑協會呼籲，反對印尼司法當局，下令非法遞解我旅印尼反共愛國僑領……特分別去電美國紐約、新加坡、馬來亞怡保、泰國曼谷、印尼椰加達〔現稱雅加達〕等地客屬僑團，呼籲一致聲援。」^{②③}這篇報導除了反映社團對台灣的國家認同外，還凸顯香港社團聯繫境外網絡的軟實力作用，地緣的親近性以及處於中西溝通樞紐的位置，讓香港社團在響應台灣政府政策、面向世界、通報各地僑社等方面扮演橋樑角色，輻射範圍無遠弗屆，豈囿於區域間。當1971年聯合國通過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會員地位，崇正總會更不諱言「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負起「國民外交工作」，爭取境外僑胞向心，在是年於香港主辦的首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上倡議發表反對聲明^{②④}。及至1990年代初，還不時有同鄉會組團赴台慶祝「雙十節」或參加總統就職典禮，以「回國」形容赴台，並以中華民國紀年^{②⑤}。

1972年，五十個同鄉會聯署批評美國干預台灣內政，以「我國」尊稱台灣、以「僑民」自居^{②⑥}；今非昔比，其中十個聯署的客籍社團：嘉應五屬同鄉會、興寧同鄉會、紫金同鄉會、中原客屬總會、河源同鄉會、惠州同鄉總會、蕉嶺同鄉會、惠州同鄉會坪洲分會、惠州十屬公會、五華同鄉會，除中原客屬總會後繼無人結束會務，嘉應五屬、惠州十屬、五華三會不表態親中，偏隅小島的坪洲分會於「雙十節」仍公開懸掛孫中山畫像及代表台灣的梅花旗外，其餘皆搖身一變成為愛國愛港社團^{②⑦}，如興寧同鄉會在香港回歸後高調

支持中國政府和特區政府施政(下詳)。雖謂上述三會沒有加入中國政府推動的香港客屬總會(下稱「客總」)，可是也不高調親台，某程度而言其政治立場接近中國政府和台灣國民黨，支持兩岸統一，反對台獨。2014年嘉應五屬同鄉會五十八周年會慶，同時邀請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處長黃新華及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聯辦)台灣事務部副部長何志明²⁸。相反，坪洲分會雖為客總會員，且參與聯署客總的報章廣告，譴責2014年發起「佔領中環」(「佔中」)行動的戴耀廷鼓吹「港獨」；但山高皇帝遠，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梅花旗依然照掛，可見社團的實際政治立場未必能夠按其表述而論²⁹。

基於歷史原因，親台社團中人較少在大陸進行商業活動，因此中國政府應用在親建制社團的利誘機制(例如委以政協委員或人大代表等身份)未必派上用場，需回歸到傳統方法如透過滲透進行統戰。嘉應五屬同鄉會便有會員來自民建聯，且毫不忌諱公開身份，而五華同鄉會甚至有具縣政協身份人士參與其中。這顯然為統戰手段，不過一眾領導人及會員均未見有不妥，似默認為大勢所趨³⁰。此類同鄉會領導人遊走於兩岸之間，不時獲邀回鄉交流，享有高規格接待。由於當中大部分人生長於大陸，家鄉情濃，樂見國家經濟強盛、家鄉繁榮，對交流並不抗拒；惟在訪談中他們均表示，絕不輕言將對家鄉的情切投射到中國政府，尤其在人權保障問題上遇到有違普世價值的情況時，會將政權和故土分開而論；另一邊廂，他們又承認對台灣政府的效忠雖日漸消弭，仍與其保持相當聯繫³¹。

以往不少社團創辦人及名譽會長均與台灣當局關係密切，或為台灣國民大會代表，或為國民政府將領。如有「南天王」之稱的民國陸軍一級上將陳濟棠，於1939至1946年出任崇正總會名譽會長，第四任陸軍總司令張發奎繼任此職至1950年，擔任該會多屆理事長的黃石華為國民大會代表；而陸軍總部



旅港嘉應五屬同鄉會是少數同時和兩岸政府保持交往的客籍社團。(圖片由莊玉惜提供)

高級參謀涂思宗則為蕉嶺同鄉會創辦人之一^⑳。此一時不同彼一時，現在的社團領導人反而具有政協或人大背景，由縣級以至市、省、全國不等，梅州總商會（前稱嘉應商會）第六十一屆領導班子六十五人中便有兩成具此等背景^㉑；梅州聯會第五屆七十二人領導班子中亦見相同百分比^㉒，深厚的中國政治人脈關係令梅州總商會和梅州聯會在眾多客籍社團中極具影響力。其中最為人熟知的莫過於曾任港區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的梅州總商會前會長（現任永遠榮譽會長）曾憲梓，其子金利來集團副主席兼行政總裁曾智明為現屆會長，同時出任全國政協委員。此外，惠州社團聯合總會會長及旭日集團董事長楊釗為全國政協委員、梅州聯會會長及裕華國貨董事總經理余鵬春身兼廣東省政協常委，不勝枚舉。與此同時，有更多名不經傳、活躍於社團的會董或理監事晉身縣或市級政協之列^㉓。

可以說，親大陸與親台灣社團涇渭分明的抗衡日子已成過去，在現實政治環境下，「再華化」所指向的「華」乃中國大陸。新時空下客籍社團「再華化」表露無遺，首先體現在創辦時間：大量社團湧現於回歸後，且悉數為愛國社團，甚具戰略意義；其次為政治立場：由過往南轅北轍的陸台對立，統合為口徑一致的愛國愛港社團，當中領導班子不少均具政協或人大背景，負有支持中港政府管治的使命。

四 構建華人網絡的政治經濟動態

改革開放初期，1980年前後已有廣東省縣市政府派代表團親臨香港參加同鄉會就職典禮或周年會慶^㉔，中國官員對同鄉會活動的參與程度出現了微妙變化，雖未必即時引起外界注視，卻標誌着組織境外華人社團的第一步，以香港為凝聚華人網絡的首站。與此同時，同鄉會領導人亦不時獲邀回鄉參與各項盛典，享有高規格接待。自1984年中英兩國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敲定香港回歸，中國政府和同鄉會交往愈發頻繁，如「高要縣政府負責人喬連玉及廣利永安區負責人梁偉文梁侯新等最近來港，祝賀旅港高要同鄉會會慶」是為一例；有的甚至浩浩蕩蕩率團到來，例如紹興同鄉會成立時，「以紹興市市長王賢芳為團長，市委秘書長俞國行為副團長，與及五縣一區負責人等組成的十一人代表團，專程來港參加昨晚同鄉會的成立儀式」，聯袂出席的還有香港新華社副社長張浚生^㉕。千里迢迢，豈只杯酒應酬？全因看準以傳統地緣紐帶結合而成的同鄉會具有龐大且緊密的會員網絡，凝聚力強，為動員鄉親投資建設家鄉的平台，在改革開放經濟框架下能達到以僑引資的作用^㉖。同鄉會領導人亦看到回鄉投資建設的商機，大都樂於以此為己任，如高要同鄉會理事長引吭表示：「要為家鄉事業出綿力，使同鄉會成為家鄉與香港同胞的橋樑。」^㉗中國政府和同鄉會這種互惠互利的關係模式一直維持至回歸前夕。

回歸後政治秩序顯然有變，誠如社會學者呂大樂早於1980年代末所預測，中國政府介入香港事務勢必增加，「可以想像，愈接近九七，中方的政治角色更加明顯。至於在地區政治參與的層面，親中人士及團體逐步抬頭，可

以說是大勢所趨。而從最近一次地方議會選舉中可見，他們將會主動介入政治，不再像從前完全放棄現存建制內的位置」⁴⁰。不過，中國政府與同鄉會於回歸後新建立的關係模式，進一步擴展至在建制外進行，後者被打造為非正規的政治工具，這不獨意味兩者關係進入新台階，超越以僑引資建設家鄉的功能，更為重要的是揭示了特區新管治模式的誕生。中國政府有計劃地推動作為社會性組織的同鄉會，以愛國愛港代表的姿態亮相，凝聚親建制的社會力量，為特區政府政策爭取社會認受性，抗衡公民社會的反對勢力，這從近年客籍社團高調支持中港政府可見一斑。

甫回歸，1999年，興寧同鄉會內具政協背景的領導人率先表態支持特區政府提請中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居民在內地所生子女居港權作出釋法決定，並重申釋法乃為了護法⁴¹。回歸初年，同鄉會獲授意的使命主要是支持特區政府施政，其後因應政治形勢急速變化，同鄉會轉化為主張維持香港穩定繁榮的社團。社團政治定位的轉變，從中國官員在社團刊物題字中可見端倪，「團結協力服務社區，為港為國造福桑梓」、「愛國愛港造福桑梓」、「攜手同心愛國愛鄉」、「同心同德同出力，愛港愛國愛家鄉」等洋溢於紙⁴²。此類「愛」字掛帥的口號式題字者，不限於省書記、省長、政協主席、統戰部部長，同樣見諸社團領導人，如興寧同鄉會榮譽理事長劉宇新題「熱愛祖國情繫故鄉」、前梅州總商會會長（現任永遠榮譽會長）黃麗群（曾憲梓夫人）題「愛國愛港敦睦鄉誼」⁴³，可見官員和社團領導人前仆後繼將愛鄉推而廣之至愛國愛港，把同鄉會打造為親建制社團。

不過，2003年「七一遊行」後，中國政府赫然發現這些社團的社會動員能力仍有欠缺。是年的大規模遊行迫使特區政府撤回《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議案（防止叛國、分裂國家等行為），而接着在年底的區議會選舉中親中陣營慘敗，流失近四成選票和議席，反映人心未回歸及反對派動員能力較強⁴⁴。為了平衡反對陣營政治勢力及增強自身影響力，具較強凝聚力的同鄉會自然被納入重點培植的社團之列，成為支持中港政府的愛國愛港社團。自2004年起，同鄉會步入快速增長期，是年至2006年分別有23、28、31個同鄉會根據《社團條例》或《公司條例》註冊成立（圖1）。與之相呼應，如前所述，2004至2018年間迅速新增了25個客籍社團，為回歸後新增同類社團的八成，增速驚人，不可小覷，可見社團創辦與政治發展密不可分。

在政治上，2004年為關鍵的一年。4月，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否決2007及2008年特區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而年底立法會選舉在即，為了抗衡公民社會潛在的抗爭，以及避免親建制政黨在選舉中再遭滑鐵盧，中國政府積極推動創辦同鄉會，其增長勢頭突飛猛進；往後基本上保持升軌，為特區政府2010年政制改革及2012年國民教育課程爭議護航⁴⁵，並在2014年反對「佔中」運動中擔起大旗。2014年「保普選反佔中」簽名運動的1,600個聯署社團中，同鄉會佔兩成，為各類社團之最⁴⁶。隨後於8月17日的相關遊行，據報導約有九萬人參加⁴⁷，僅晉江同鄉會便動員了多達11,000人⁴⁸。

據筆者的考察，同鄉會激增方法主要有以下五種方式：第一，發掘新點，鼓勵未有同鄉會的區或鄉創辦，如河源市源城同鄉會和豐順同鄉聯誼總

會。第二，細胞複製，愛國社團五華同鄉總會與原先親台的五華同鄉會分庭抗禮，該縣同時另設五個宗親會，總會解說該縣同鄉眾多，現有社團不足以容納及服務之，「為了適應新時期形勢發展的需要，大力弘揚愛國愛鄉，造福桑梓」，有另起爐灶之要^④。第三，細胞分裂，以地緣為基礎細分為市、縣、鎮、鄉、村，以市及村的例子有惠陽社團總會、惠陽塘尾朱氏促進會，而市及鎮級同鄉會分別有惠東同鄉會，惠東平海、黃埠鹽洲同鄉會。第四，按不同名義組合，如同鄉會、聯誼會、宗親會、促進會等，包括梅州社團總會、梅州聯會、港區梅州市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惠陽塘尾朱氏促進會、惠陽蘇徐李鍾石五姓宗親聯會，多不勝數。第五，設立地區辦事處，如惠州市惠城區聯誼會設港島和新界兩分會：惠州市惠城區（香港）聯誼會、惠州市惠城區（香港）聯誼會新界西分會，福建同鄉會則在將軍澳設有分會。

雖然社團背景高度重疊，社團人員亦多有重複，不過卻令社團的大規模複製得以成事。活躍份子紛紛獲邀加入不同社團，互相支援營造聲勢，一人擁有四五個會籍甚為普遍^⑤。譬如河源社團總會主席吳惠權，除了是客總主席外，還是梅州總商會和河源市源城同鄉會的永遠名譽會長，以及梅州聯會諮議會成員；蕉嶺同鄉會理事長聶振，同時為客總會董和梅州聯會常董；客總執行主席曾智明，身兼多職，包括梅州總商會會長、河源社團總會榮譽顧問、五華同鄉總會榮譽顧問。這種連鎖關係在社團領導層之間形成一個命運共同體，而最關鍵的是壯大社團聲勢，建立獲社會廣泛支持的形象，為特區政府政策護航時增添認受性^⑥。

細胞複製的動力，全仗中國政府的鼓勵、官員積極參與，以及政治形勢的轉變。2000年代末始創辦的一個社團，其領導人在訪談中充分反映了這種情況：該會在內地官員熱情鼓勵下成立，成立時異常倉卒，甚至連會址也欠奉，得借會員家居又或酒樓開會，及至有財力者在政府穿針引線下出任會長並承擔會址及會務支出，經年的「走鬼式」運作始告終^⑦。五華同鄉總會會長周樹菁在2004年成立大會致詞中亦明言：「在籌備期間得到家鄉梅州市五華縣政府的關心。」^⑧無獨有偶，河源市源城同鄉會理事長潘衍章在會刊發刊詞中，將桑梓熱情形容為「這一成績有賴河源市市委市府、源城區委區府……有關領導時賜方針與關懷」^⑨。儘管「時賜方針」、「關心」、「關懷」等用詞含蓄，卻蘊含中國政府對社團的關切。相較以上兩會的含蓄用詞，佛山社團總會主席鄧祐才在會址揭牌儀式中坦言，政府在方向性及精神上予以指導^⑩。這些指導主要圍繞兩個原則：積極響應家鄉招商引資，以及在中國政府與香港社會交流中貫徹愛國愛港為核心價值^⑪。

近年香港政治形勢錯綜複雜，為了作出適切指導從而有效組織群眾，中國政府甚至派員出任社團顧問，這無疑是將社團納入中國政治體系內，發展為政治權力基礎，透過它們建立與其理念相符的社會秩序——民主步伐循序漸進、保持經濟繁榮穩定。以五華同鄉總會為例，顧問悉具官方背景，身份多樣化，由市長、縣長、市及縣的政協主席、書記、統戰部長、環保局紀委書記以至解放軍將領，而香港中聯辦亦派員出任榮譽顧問；顧問人數與年俱增，由2004年的八人躍升至2016年的二十一人^⑫。與此同時，蕉嶺同鄉

會亦邀得廣東省政協委員、曾任職於該縣南礮公社的前黨委副書記劉嘉榮出任名譽顧問^⑥。此外，政府也付諸實際行動贊助社團活動，金額動輒數以十萬計^⑦。

此外，近年社團組合亦呈現出新的形態，中國政府將互不從屬、結構鬆散的社團，統合在其授意設立的總會下，納入行政體系內，形成中聯辦—大型總會—小型聯會或總會—個別社團組成的四級行政制度。在個別社團之上不獨設有小型聯會或總會，更在聯會或總會上另設大型總會，形成「總上總」的層層疊疊現象。例如，河源社團總會、梅州聯會、惠州社團聯合總會，通通成為2011年始成立的客總會員。設立聯會或總會本不是新鮮事，旨在便利統合地緣相近的社團，以往社團與聯會或總會互不隸屬，且在小型聯會或總會上沒有增設大型總會；按新設計，客總乃按行政管理構思設置，統籌各客籍社團的聯合活動，並充當與官方溝通的對口單位，便於為執政者協調各個社團。這種做法一改社團平行發展的傳統，將聯會、總會或個別社團置於客總旗下，形成上下等級，改變了社團政治生態。

有趣的是，小型聯會或總會轄下的團體會員（以社團名義加入），又可以以獨立身份成為客總一員，除了五華同鄉會外，梅州聯會旗下五個客籍社團會員悉數為客總會員，梅州社團總會十八個社團會員亦統歸客總麾下，令小型聯會或總會徒具虛名，在客總內淪為無兵司令。部分以總會冠稱的社團如五華同鄉總會和梅州總商會，不設團體會員。為了區別於政治立場迥異的五華同鄉會，親中社團五華同鄉總會特意以「總會」命名，驟看儼如五華縣各個同鄉會之首，連結了大群同鄉組織。無怪乎和平縣聯誼總會和豐順同鄉聯誼總會，雖不見設有團體會員，仍爭相冠以總會名義。

2003年「七一遊行」讓中聯辦和中央統戰部意識到香港社會對特區政府施政存有不滿，兼且2007年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2017年第五屆特區行政長官可由普選產生^⑧，因此急需加強群眾工作。「七一遊行」翌年以降，與中國政府關係緊密的同鄉會迅即湧現，客籍社團亦熱熾響應。冷不防2014年一場「佔中」行動，大學生大規模參與，曝露其中青年版塊的統戰工作未臻完善，因此近年中國政府愈發積極推動社團領導班子年輕化，培植青年人當領導，更不乏年僅三十者獲邀出任縣政協委員，其中五華同鄉會及蕉嶺同鄉會內年青領導班子早獲青睞，被栽培為擁護特區政府施政的新興青年親建制力量^⑨。

在此大國框架下湧現的社團全為「天然親中」，客總的成立宗旨開宗明義指出：「堅持愛國愛港愛家鄉，團結香港客籍鄉親，參與香港社會事務，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維護香港繁榮穩定，推動香港與內地的合作交流和家鄉的經濟建設。」^⑩這根本性地決定了社團性質及運作模式，重大活動例必邀請中國官員為主禮嘉賓，以2014年五華同鄉總會第六屆會董就職典禮為例，邀請的官員橫跨多個單位，包括市及縣政府和政協、統戰部、中聯辦台灣事務部、外事僑務局等^⑪。社團陣容愈盛大愈能確認愛國情操，無不爭相以此為榮，甚至因此形成衝突，互相攻訐愛國愛港力度未符理想，需中聯辦居中協調^⑫。

至於具體愛國表現，最明顯莫過於在立法會、區議會選舉中支持愛國愛港陣營，河源市源城同鄉會更以「不忘國恥」號召鄉親投票支持⁶⁶。一名同鄉會領導人就2018年3月立法會補選向會員發出呼籲：「這次補選對未來立法會的順暢運作非常重要。……為香港未來選出理性，務實，為社會，為市民付出的候選人。近兩年香港變得非常政治化，有某些議員沒盡心為香港設想，不斷拉布〔阻撓議事〕，讓社會停滯不前……。本人非常認同以下候選人的參政理念和能力……。如果你或你的朋友心目中還未有肯定的候選人，請多多支持我的推薦……」⁶⁶這種二元分化的信息將「拉布」等同不理性、不務實、不為社會福祉着想，結果是社會發展停滯不前；接着委婉地開列投票名單。可見同鄉會堪稱親建制派候選人的選舉票倉，能夠提供源源不絕的「鐵票」，在它們的堅實支持下，政治立場保守的參選人又或政治素人往往穩操勝券⁶⁷。其他表現包括舉辦街頭簽名活動、參加遊行、刊登報章廣告支持特區政府施政，前文已述，在此不贅。另外還有一些相對靜態的活動，如舉行國情研習班，龍川同鄉會於2017年底聚合百人學習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以增強對國家的認同感⁶⁸。愛國表現多元化，錦上添花少不了，自1971年香港主辦首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客籍社團再度奪魁，2017年第二十九屆大會重臨香江，便是在中國政府推動及社團配合下促成的，蘊含慶賀雙重回歸之意⁶⁹。

社團熱烈響應政府的推動，箇中原因複雜，簡而言之，社團是和中國政府建立關係的平台，社團領導人利用此平台，以「蛇齋餅糶」等物質利益利誘會員支持特區政府施政及建制派候選人，換取中央政府給予政治經濟利益，如獲薦出任政協委員或人大代表，有利在中國大陸謀求更大商機，是故侍從主義（Clientelism）之說不脛而走，同鄉會被指淪為中國政府的政治工具⁷⁰。因此，同鄉會高姿態支持特區政府，不時被傳媒形容為「盲從」，如〈同鄉會睇貓紙撐政府〉；或淪為中國政府的政治工具，如〈新設建制社團颯兩倍 佛山總會統戰部中聯辦助建 表明助選〉、〈香港泉州同鄉會嚴斥「港獨」 齊發聲力撐立法會選舉〉等報章標題⁷¹。雖然親建制社團被視為建制派候選人的票倉，且在統合親建制社會力量上具有顯著成效；不過，無視整體社會聲音，一面倒支持中港政府，顯然有礙社團作為政府和民間社會的溝通橋樑，未能更好和更有效地發揮凝聚民間的軟實力作用。

五 總結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在中國政府推動下香港的親建制社團大量湧現，內地官員出任社團顧問，社團以支持特區政府施政和愛國愛港陣營參選為己任，盡現中國政府在社團「再華化」方面的推手角色。改革開放初期，在以僑引資的大前提下，社團為家鄉和香港鄉親搭建橋樑。及至回歸以後，中港政治及經濟進一步融合，香港被納入國家體系內，政府和社團關係亦產生微妙變化，受政府指導並重整為其在民間社會的權力基礎，令社團失卻自主性及

獨立性。這在2003年「七一遊行」及2014年「佔中」後尤為明顯，社團被賦予新使命，肩負愛國愛港重任。這裏除了說明這些社團在微觀的中國大陸與香港政治中，起着穩定香港、不為國家添煩添亂的政治功能外，更連繫到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復興。此種由上而下刻意培植的「再華化」，令社團由聯誼鄉親的橋樑搖身一變為政府管治夥伴以至政治工具，親中建制形象溢於言表，顯然影響其凝聚民間社會、聯繫跨國華人網絡的軟實力作用。

集全球網絡資訊、資金、貨物流通於一身，加上處於境外華人網絡樞紐的有利位置、面向全球的香港，向來為中國和境外華人溝通的中介，本地社團有條件夥拍中國政府，在新政治經濟格局下凝聚香港社會及其他境外華人社會，展示中華文化凝聚力的魅力，關鍵乃在於政府和社團建立關係的模式，是否建基於合作夥伴關係，讓社團還原其民間中介組織角色，抑或淪為政治載體，聽命於自上而下的國家指令。

註釋

- ① 這裏所指的社團，為以傳統原則如語緣、地緣、血緣、業緣等組合而成的志願組織。
- ② 李明歡：《當代海外華人社團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6）；丘立本：〈從歷史的角度看東南亞華人網絡〉，《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98年第3期，頁1-7；Hong Liu, "Old Linkages, New Networks: The Globaliz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nd Its Implic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55 (September 1998): 582-609。
- ③ 鄭達：〈論馬來西亞華人地緣性社團的發展——以吉隆坡、雪蘭莪兩地為例〉，《世界民族》，2010年第6期，頁69-76。
- ④ 李明歡：《當代海外華人社團研究》；鄭達：〈論馬來西亞華人地緣性社團的發展〉，頁69-76。
- ⑤ 李明歡：《當代海外華人社團研究》；莊國土、劉文正：《東亞華人社會的形成和發展：華商網絡、移民與一體化趨勢》（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
- ⑥ 莊國土、劉文正：《東亞華人社會的形成和發展》，頁251。按記錄顯示，1979至1989年間，海外華人捐款約五十五億人民幣，而匯款更高達四十五億美元，參見Mette Thunø, "Reaching Out and Incorporating Chinese Overseas: The Trans-territorial Scope of the PRC by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8 (December 2001): 918-19。
- ⑦ 鄧小平：〈搞建設要利用外資和發揮原工商業者的作用〉，載《鄧小平論僑務工作》（北京：國務院僑務辦公室，1998），頁21。
- ⑧ 張妙清、鄭宏泰、尹寶珊：〈核心價值〉，載張妙清、趙永佳編：《香港特區二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2017），頁57-84；Eliza W. Y. Lee, "Governing Post-colonial Hong Kong: Institutional Incongruity, Governance Crisis, and Authoritarianism", *Asian Survey* 39, no. 6 (1999): 940-59; Tai-lok Lui and Stephen Wing-kai Chiu, "Governance Crisis and Changing State-Business Relations: 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in *Repositioning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Social Foundation and Political Challenges*, ed. Stephen Wing-kai Chiu and Siu-lun W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91-122。
- ⑨ 陳健民：〈香港的公民社會與民主發展〉，《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1年12月號，頁23-31；Brian C. H. Fong, "State-Society

Conflicts under Hong Kong's Hybrid Regime: Governing Coalition Building and Civil Society Challenges”, *Asian Survey* 53, no. 5 (2013): 854-82。

⑩ 商界佔據大量行政會議及諮詢組織的席位，引發官商勾結之嫌，令其無法充當政府和社會之間的中介。參見 Brian C. H. Fong, “State-Society Conflicts under Hong Kong's Hybrid Regime”, 854-82; Tai-lok Lui and Stephen Wing-kai Chiu, “Governance Crisis and Changing State-Business Relations”, 91-122。特區政府沿襲中國政府對政黨存有懷疑的一貫態度，政黨被邊緣化，未能發揮政治功能，協調政府和社會的關係。參見 Ma Ngok,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State, Political Society, and Civil Societ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Wing-yat Yu, “Dynamics of Party-Mass Relations: The Organizational Failure of Hong Kong's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July 1 Protest Rally: Interpreting a Historic Event*, ed. Joseph Y. S. Cheng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5), 249-76。

⑪ 例如龍川同鄉會3,000人、梅州聯會800人、蕉嶺同鄉會及五華同鄉總會分別有400人、崇正總會2,000人、安慶堂100人。資料來源為筆者對客籍社團領導人的訪談筆記，訪談於2017年11月至2018年2月在香港進行，被訪的五十名領導人來自十個社團，在領導層內擔任不同崗位，參與社團的年資亦不盡相同。

⑫ 參見民建聯網站的會員人數，www.eng.dab.org.hk/about-dab/basic-info/。

⑬ 2006年根據《社團條例》(第151章)註冊的同鄉會為數133個，參見香港立法會：〈立法會十六題：同鄉會〉(2006年12月6日)，政府新聞網，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612/06/P200612060157.htm。若考慮到或涉商業經營或產權轉移，為明確責任，亦可根據《公司條例》(第23章)向公司註冊處申請註冊為有限公司，是年有253家公司名稱中含「同鄉會」一詞。任擇其一，互不重疊，兩類註冊合共386個。2017年，經社團註冊的同鄉會數目攀升至305個，參見立法會：〈立法會十九題：社團及非牟利團體的註冊事宜〉(2017年5月24日)，政府新聞網，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5/24/P2017052400816.htm。另參見香港警務處社團事務處：〈已獲註冊或豁免註冊的社團或分支機構名單〉(2017年12月)，www.police.gov.hk/info/doc/srr012n.pdf。由於資料匱乏，無法掌握根據《公司條例》註冊的同鄉會數目，如按社團註冊的增幅推算，經公司註冊的將更多，由此推論兩者合併後數量約為八百個。

⑭ 按「軟實力」概念提出者奈(Joseph S. Nye)的定義，國家軟實力建基於凝聚力、文化、價值觀等，透過吸引人們心悅誠服追隨，而非以武力或利誘。參見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⑮ 濱下武志：《香港大視野：亞洲網絡中心》(香港：商務印書館，1997)；《中國、東南亞與全球經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⑯ 兩岸政府透過華人社團進行的僑務工作，參見古華民：〈淺論海外華僑華人社團變化和發展趨勢〉，《中國發展》，2002年第1期，頁53-54；莊國土、劉文正：《東亞華人社團的形成和發展》；Philip A. Kunn,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8)；范如松：《僑務工作的理論與實踐》(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2)。

⑰ 有數字顯示，全球共6,000多萬客家人，其中5,000多萬在中國，台灣有約500萬，其餘800多萬分布各地，遍及港澳、馬來西亞、澳洲、美加、歐洲。參見蕭新煌：〈《海外客家研究叢書》總序〉，載張翰璧：《東南亞客家及其族群產業》(中壢：中央大學出版中心，2013)，頁i-ii。

⑱ 本文排除梅州社團總會的香港熊氏宗親總會及梅州聯會的香港南洋輸出入商會，原因是兩者並不以客籍會員為主。參見客屬總會網，www.hkhakka.com/page/1000037.html；梅州社團總會網，www.hk-mz.com/member；梅州聯會網，www.hkmza.org/member。

⑲ 陳麗華：〈客家網絡社群資源之比較：以台灣、中國和馬來西亞為例〉，《全球客家研究》，2017年第8期，頁77-118；鄭赤琰：〈海內外客家社團的文化網絡〉，「第二十九屆客屬懇親大會」研討會(香港，2017年10月12日)。

- ⑳ Ching-hwang Yen,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Beyond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08).
- ㉑ 李明歡：《當代海外華人社團研究》；莊國土、清水純、潘宏立：《近30年東南亞華人社團的新變化》（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
- ㉒ 〈南海縣夏教同鄉會第四屆理監就職〉，《華僑日報》，1985年6月11日；〈新會潮連同鄉會〉，《華僑日報》，1991年10月28日。
- ㉓ 〈興寧同鄉通電抗議印尼當局非法遞解華僑〉，《工商日報》，1954年10月10日。
- ㉔ 崇正總會：《香港崇正總會出席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報告書》（香港：崇正總會，1973），頁11。
- ㉕ 嘉應五屬同鄉會：《旅港嘉應五屬同鄉會會刊》（香港：嘉應五屬同鄉會，1976），頁50；〈紫金同鄉會回國祝雙十〉，《華僑日報》，1984年10月8日；〈五華旅港同鄉會組團慶雙十〉，《華僑日報》，1989年10月4日；〈僑港惠州同鄉會慶祝雙十辦聯歡〉，《華僑日報》，1991年9月9日。
- ㉖ 〈香港同鄉聯合總會不滿美國妄斷〉，《華僑日報》，1972年4月10日。
- ㉗ 其中，惠州同鄉會坪洲分會易名為「坪洲惠州同鄉會」，五華同鄉會稱「五華旅港同鄉會」。
- ㉘ 該會雖然沒有加入客總，但客總在刊物中仍將其會慶列作團體會員活動。參見〈團體會員活動選萃〉，《香港客家》，2014年第4期，頁63。
- ㉙ 〈強烈譴責戴耀廷「港獨」言行〉，《文匯報》，2018年4月6日。
- ㉚⑳㉛㉜㉝㉞㉟㊱ 訪談筆記，香港，2017。
- ㉛ 五華同鄉會及嘉應五屬同鄉會是少數同時和兩岸政府保持交往的客籍社團，除了到中國大陸及台灣交流，還邀請兩岸駐港代表如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及中聯辦出席年度會慶。參見五華旅港同鄉會：《五華旅港同鄉會七十周年特刊：1946-2016》（香港：五華旅港同鄉會，2016），頁103-107；〈團體會員活動選萃〉，頁63。五華同鄉會特刊內雖見中華民國總統及副總統蔡英文和陳健仁的題字，但為免觸發政治衝突，兩人職銜欠奉。此舉充分反映此類社團在政治隙縫中生存之難。
- ㉜ 崇正總會：《崇正總會三十周年紀念特刊》（香港：崇正總會，1950）；嘉應五屬同鄉會：《旅港嘉應五屬同鄉會三十周年紀念特刊》（香港：嘉應五屬同鄉會，1986）。
- ㉝ 黃獎主編：《百年嘉應：香港嘉應商會一百周年》（香港：陳湘記圖書有限公司，2016）。
- ㉞ 梅州聯會：《香港梅州聯會成立一百二十周年》（香港：梅州聯會，2016）。
- ㉟ 三水同鄉會：《旅港三水同鄉會成立九十周年暨春節懇親大會特刊》（香港：旅港三水同鄉會，2002），無頁碼；Elizabeth Sinn, "Xin Xi Guxiang: A Study of Regional Associations as a Bonding Mechanism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The Hong Kong Experience", *Modern Asian Studies* 31, no. 2 (1997): 375-97。
- ㊱ 〈高要負責人來港祝賀同鄉會會慶〉，《大公報》，1986年8月6日；〈紹興同鄉會成立紹興市長率團來港參加〉，《大公報》，1988年6月19日；〈新會潮連同鄉會〉，《華僑日報》，1991年10月28日；〈溫州同鄉會新員〉，《大公報》，1991年11月4日。
- ㊲ Elizabeth Sinn, "Xin Xi Guxiang", 375-97; Ezra. F. Vogel,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㊳ 〈高要負責人來港祝賀同鄉會會慶〉；〈吳縣同鄉會組團回家鄉考察返港〉，《大公報》，1991年11月5日；〈寧波市代表團訪港 旅港寧波同鄉會前晚設宴招待〉，《大公報》，1991年12月2日。
- ㊴ 呂大樂：〈團體壓力政治與政治參與——本地經驗的觀察〉，載鄭宇碩編：《過渡期的香港》（香港：三聯書店，1989），頁11。
- ㊵㊶ 興寧同鄉會：《旅港興寧同鄉會六十周年會慶特刊：1939-1999》（香港：興寧同鄉會，1999），頁48；25、27。

- ⑳ 興寧同鄉會：《旅港興寧同鄉會六十周年會慶特刊》；五華同鄉總會：《香港五華同鄉總會成立典禮特刊》（香港：五華同鄉總會，2004）；蕉嶺同鄉會：《僑港蕉嶺同鄉會特刊》（香港：蕉嶺同鄉會，2013）。
- ㉑ 〈民建聯需重新定位〉，《東方日報》，2003年11月25日；〈民建聯當選率三成 曾鈺成請辭〉，《明報》，2003年11月25日。
- ㉒ 〈十二萬人集會遊行撐政改〉，《星島日報》，2010年6月20日；〈撐國教科婦 甚麼也不知 政總國教集會 內地組織組團來港〉，《明報》，2012年10月18日。
- ㉓ 參見保和平保普選大聯盟網，www.sign4peacedemocracy.hk/index.php?r=index/index。
- ㉔ 〈反佔中的神聖同盟〉，《信報財經新聞》，2014年8月18日。
- ㉕ 〈反佔中組織 同鄉會佔兩成最多〉，《明報》，2014年8月16日。
- ㉖ 五華同鄉總會：《香港五華同鄉總會成立典禮特刊》，頁2。
- ㉗ Scott E. Bennett, *Applying Public Opinion in Governance: The Uses and Future of Public Opinion in Managing Government* (Cham,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Harwood L. Childs, *Public Opinion: Nature, Formation, and Role* (Princeton, NJ: D. Van Nostrand Co., 1965).
- ㉘ 五華同鄉總會：《香港五華同鄉總會第二屆會董就職典禮特刊》（香港：五華同鄉總會，2006）。
- ㉙ 〈發刊詞〉，《源城會刊》，2011年第1期，頁3。
- ㉚ 〈佛山社團總會會址揭牌〉，《文匯報》，2014年10月7日；〈新設建制社團靚兩倍〉，《明報》，2015年1月19日。
- ㉛ 參見五華同鄉總會：《香港五華同鄉總會成立典禮特刊》；《香港五華同鄉總會第二屆會董就職典禮特刊》；《香港五華同鄉總會第三屆會董就職典禮特刊》（香港：五華同鄉總會，2008）；《香港五華同鄉總會第五屆會董就職典禮特刊》（香港：五華同鄉總會，2012）；《香港五華同鄉總會第六屆會董就職典禮特刊》（香港：五華同鄉總會，2014）；《香港五華同鄉總會第七屆會董就職典禮特刊》（香港：五華同鄉總會，2016）。
- ㉜ 蕉嶺同鄉會：《僑港蕉嶺同鄉會特刊》，頁89。
- ㉝ 此點獲不同社團領導人默認，惟一切不宣於紙。訪談筆記，香港，2017。
- ㉞ 香港特區政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www.basiclaw.gov.hk/tc/basiclawtext/images/basiclawtext_doc23.pdf。
- ㉟ 《香港客家》，2014年第4期，頁1。
- ㊱ 五華同鄉總會：《香港五華同鄉總會第六屆會董就職典禮特刊》，頁8。
- ㊲ 〈尊重選民權利與認識投票意義〉，《源城會刊》，2011年第4期，頁4。
- ㊳ 〈拆解建制派精準配票之謎〉，《香港經濟日報》，2012年9月12日；〈港島補選或兩雌相遇 陳家珮單挑眾志女將〉，《信報財經新聞》，2017年11月1日。
- ㊴ 〈客家龍川青年聚 學習十九大精神〉，《大公報》，2017年12月27日。
- ㊵ 訪談筆記，香港，2017；〈世客會十月賀雙重回歸〉，《大公報》，2017年9月12日。
- ㊶ 〈817反佔中的話題傳銷與同鄉族群動員〉（2014年8月13日），獨立媒體網，www.inmediahk.net/817；〈政制向錢走 左派造勢撐政改 利誘遊行每人派\$200〉，《蘋果日報》，2010年6月6日。
- ㊷ 相關報導參見《蘋果日報》，2013年11月7日；《明報》，2015年1月19日；《大公報》，2016年9月2日。

莊玉惜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鄭宏泰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助理所長

香港客籍社團成立時間表

成立年份	社團名稱	成立年份	社團名稱
1. 1893	香港安慶堂	37. 1991	香港曲江同鄉聯誼會
2. 1896	香港梅州聯會	38. 1995	香港紫金聯誼會
3. 1916	香港梅州總商會	39. 1996	香港惠州社團聯合總會
4. 1921	崇正總會	40. 1999	香港河源社團總會
5. 1930年代	香港惠陽商會	41. 1999	香港龍川同鄉會
6. 1938	旅港興寧同鄉會	42. 2001	香港深圳布吉同鄉總會
7. 1946	香港五華同鄉會	43. 2002	香港梅縣三鄉同鄉會
8. 1946	僑港惠州同鄉總會	44. 2003	惠陽塘尾朱氏促進會
9. 1948	香港紫金同鄉會	45. 2004	香港五華同鄉總會
10. 1949	香港惠州同鄉總會	46. 2005	梅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11. 1954	僑港博羅同鄉總會	47. 2006	香港惠陽社團總會
12. 1954	嘉應五屬同鄉會	48. 2006	香港深圳市龍崗同鄉會
13. 1956	上水惠州同鄉會	49. 2006	香港新豐同鄉會
14. 1956	大埔僑港惠州同鄉會	50. 2008	香港和平縣聯誼總會
15. 1956	元朗惠州同鄉會	51. 2008	香港東源同鄉會
16. 1960年代	僑港廣東龍門同鄉總會	52. 2008	香港河源市源城同鄉會
17. 1960	僑港蕉嶺同鄉會	53. 2010	香港寶安大龍華同鄉會
18. 1962	香港興寧同鄉總會	54. 2011	香港平遠同鄉會
19. 1965	荃灣惠州同鄉會	55. 2011	香港南雄聯誼會
20. 1966	坪洲惠州同鄉會	56. 2011	香港客屬總會
21. 1969	香港梅縣同鄉會	57. 2012	港區梅州市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
22. 1969	大埔縣旅港同鄉會	58. 2012	香港豐順同鄉聯誼總會
23. 1971	香港新界博羅同鄉福利會	59. 2012	香港連平聯誼會
24. 1972	新界興寧聯誼會	60. 2014	香港清遠社團總會
25. 1972	香港惠州十屬公會	61. 2014	香港惠東同鄉社團總會
26. 1976	僑港博羅同鄉會新界分會	62. 2015	香港仁化同鄉聯誼會
27. 1976	香港大鵬同鄉會	63. 2015	香港梅州社團總會
28. 1977	南丫島惠州同鄉會	64. 2015	惠州市惠城區(香港)聯誼會
29. 1977	旅港興寧吳氏宗親會	65. 2016	惠州市惠城區(香港)聯誼會新界西分會
30. 1980年代	香港東山中學校友會	66. 2016	香港客屬總會新界分會
31. 1980年代	香港興寧一中校友會	67. 2017	香港河源政協歷屆委員會聯誼會
32. 1981	荃灣興寧同鄉福利會	68. 2018	平海、黃埠鹽洲同鄉會(惠東)
33. 1981	世界客屬總會香港分會	69. 2018	香港興寧婦協聯誼會
34. 1982	梅州中學(香港)校友會	70. 不詳	香港惠陽蘇徐李鍾石五姓宗親聯會
35. 1986	旅港五華黎塘李氏宗親會	71. 不詳	香港樂昌同鄉會
36. 1987	香港惠東同鄉會	72. 不詳	香港翁源同鄉會

資料來源：報章、客籍社團刊物及網站。